

制度型族群聚集与多向分层融入^{*}

——基于广州南涌华侨农场两个归难侨群体的比较研究^{**}

□黎相宜

[摘要] 以广州南涌华侨农场的两个归难侨群体作为比较个案,探讨其产生多向分层融入的原因。研究发现,不同难侨群体所形成的聚集状况与亚群体网络内部形成的资源及文化价值观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马来亚归难侨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履历”形成了强势聚集,其亚群体网络所主导的价值观及内部资源能够引导归第二代避开农场亚文化的负面影响,顺利融入进本地主流社会中。而越南难侨及其第二代则是一种弱势聚集,其所形成的与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亚文化以及网络内部贫乏的资源使个体更易于融入本地社会的边缘层中。

[关键词] 制度型族群聚集;多向分层融入;归难侨;华侨农场;南涌街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5)01-0056-10

Institutional Ethnic Enclave and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Groups in Nanyo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of Guangzhou

LI Xiang-yi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wo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groups from Nanchong Overseas Chinese Farm of Guangzhou as cases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reasons of th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he gathering conditions, the resources and cultural values formed in sub-group networks of different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groups are the key elements.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from Malaysia, thanks to their "political resume", form the advantaged gathering. The values proposed by their sub-group networks and their resources could guide the second generation to avoi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farm subculture and to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While a disadvantaged gathering is seen among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second generation from Vietnam, for their subculture conflicts with the mainstream culture value and resources within their network are poor, causing the individuals to be prone to the marginalized part of the local society.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ethnic enclav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farm; Nanyong Street

*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项目“归难侨群体的多向分层融入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D13YHQ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 南涌华侨农场于2008年已经正式改成街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称之为“南涌街”。但由于本文论述内容涉及农场的几次体制改革的历史,南涌街当时仍然还是农场体制,为了还原当时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突出社区内拥有众多归难侨群体的特征,本文的标题仍然沿用“华侨农场”,在论述当时的历史情境时亦会采用“南涌华侨农场”,而论述现在状况则会采用“南涌街”。

一、问题的提出

移民的社会融入与适应是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议题,是指移民在历时多久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经济和文化上融入迁入地社会。国际移民研究有两大理论解释外来移民的适应过程,一是线性同化理论(straight-line assimilation theory),二是多向分层同化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线性同化理论认为,移民同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移民到美国后,经过长期努力,逐渐摒弃来源地文化,接受当地文化,并最终在经济机会上与美国人趋同(R. E. Park and E. W. Burgess, 1921; M. Zhou, 1997; R. Alba, V. Nee, 1997)。然而,线性同化理论描述的单一同化路径难以描述和解释当代移民的融入过程。在此背景下,多向分层同化理论应运而生。多向分层同化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族裔的移民群体被困在社会底层,而另外一些族裔的移民群体则能避开这种悲剧性歧途(周敏, 2013)。多向分层同化理论考虑到由于不同少数族裔在迁入地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移民群体中和群体间将会产生不同的融合结果,主要表现为融合于以非拉丁裔白人为主导的核心文化和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导的主流社会、融合于本土边缘社会亚文化、通过族裔经济实现选择性融合三种不同的模式(A. Portes, M. Zhou, 1993; A. Portes, 1995)。多向分层同化理论还进一步指出,通过第三种选择性融合的模式也即依赖族群聚集有助于使个体实现社会适应。后续亦有学者提出相反意见,指出族群聚集造成了移民与主流社会的隔离,族群聚集企业中的雇主更可能利用亲缘和地缘关系剥削同族群的劳工,这些都会进一步限制移民的融入(Y. Xie, J. E. Brand, B. Jann, 2012; E. Bonacich, 1987)。

针对上述的争论,波特斯指出,族群聚集带来正面抑或负面效应与群体网络内部的资源性质和多寡有着密切关系(A. Portes, 1998)。强势聚集的群体内部的资源较多,群体内部成员通过共享资源更有可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Y. Xie, M. Gough, 2011)。如果进入族群聚集的移民是在公开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缺乏技能或语言能力的人,这种弱势聚集可能掩盖了族群聚集的优势(张春泥、谢宇, 2013)。

关于“聚集命题”(enclave thesis)的争论颇多,但上述研究讨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采取主动实现族群聚集的移民身上,认为在迁入地社会遇到文化不适应和就业困难是族群聚集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族群聚集是移民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的自由选择结

果。这类族群聚集可统称为“自由型族群聚集”。然而,还存在一种由外在结构性力量造成而不是个体选择导致的“制度型族群聚集”,它却往往为现存理论和研究所忽视。实际上,这种族群聚集类型并不少见,发生这种聚集的成员大多经历了由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或民族国家政策调整造成的“强制迁移”(如很多成员具有难民经历),而在迁入新移居地或安置地时又多由民族国家及政府行政力量促成其族群聚集,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难民集中营。虽然有些学者运用多向分层同化论来解释一些特殊的移民类型——比如安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难民及其第二代的适应模式(M. Zhou, C. L. Bankston III, 1994; M. Zhou, C. L. Bankston III, 1998; C. L. Bankston III, M. Zhou, 1997)尽管这些国际难民进入移居地后经历了一个被安置的过程,但是其族群聚集的实现主要是国际难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非宏观制度与政策所引致的。中国内地的华侨农场、水库移民安置区等(陈晓毅、马建钊, 2006; 黎相宜、周敏, 2013)也是如此。与自由型族群聚集相比,处于制度型族群聚集之下的族群成员的多元社会适应结果不仅取决于其来源地、迁入前后的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所携带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本等个体与家庭因素,还与族群聚集区内部的社会经济资源多寡与亚群体网络、族群的聚集状况以及国际社会、民族国家政策的制度支持等中观、宏观因素密切相关。

本文将试图讨论“制度型族群聚集”中的特例——被集中安置在华侨农场的归难侨群体。华侨农场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因特殊历史事件,经由特殊历史决策而形成的与本地社会相对区隔的特殊社区。农场归难侨群体的“族群聚集”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由国家政策及行政力量所主导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转型大背景下,行政干预减弱而市场力量增强,作为计划经济产物的华侨农场遭遇了空前强烈的冲击(李明欢, 2003)。这深刻影响了农场内的归难侨及其子女在安置地的多元适应与融入状况(刘朝晖, 2003; 姚俊英, 2009; 俞云平, 2003; 奈仓京子, 2010: 145~152; 孙晟, 2003)。即使在同一农场里,不同安置时间、来自不同国家的归难侨群体的融入结果也呈现着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在以往研究中曾被笼统提及(李明欢, 2005: 174~176; 奈仓京子, 2010: 145~152),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影响这种差异的社会文化机制是如何形成的。

因此,笔者将结合多向分层同化理论及相关的族群聚集研究,分析归难侨群体本身的聚集状况及

亚群体网络内部所形成的资源和价值观念是如何与个体、家庭、华侨农场、本地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因素互动,共同影响集中安置在同一华侨农场、但安置时间不同且来自不同国家的归难侨群体的多向分层融入进程的。

本文所使用的实证材料均来自2013年、2014年暑期及2014年寒假在广州南涌华侨农场的田野调查。广州南涌华侨农场于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是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在原有农场基础上办起的全国第一个华侨农场,起初用于安置马来亚及少数印尼归难侨1100多名。当时农场正值土改,有部分原属南涌三角洲附近农村的农民以“带地入场”的方式,由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加入农场成为正式职工,这批原籍农民及其后代形成了农场内的“本地人”群体。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越南排华,1978年农场首批接待安置越南难侨500多人,至1986年底止,共安置难侨4497人。^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南涌华侨农场先后经历了设立管理区、撤区设街的体制改革。^②截止至调查为止,南涌街(前身为南涌华侨农场)辖区面积41.5平方公里,设9个居民委员会,常住人口近3万人,其中归难侨、侨眷约4300人。^③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南涌华侨农场经历了较大的历史变迁,而生活在农场内的马来亚与越南归难侨群体却在同样的制度转型与改革进程中呈现不同的社会适应结果,这种差异在他们的第二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归难侨群体都是在移居国出现政治动乱及排华时期一无所有地回到农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及其第二代的融入产生如此矛盾的结果呢?下面笔者将主要从两个群体的聚集状况以及亚群体网络出发,结合个体、家庭以及华侨农场、政府等多个层面来解释上述两个归难侨群体在社会适应上的差异。

二、重建“家园”:马来亚 归难侨群体的强势聚集

华侨农场是一个相对偏离主流社会的社区,是本地社会的一部分,但又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体现了群体和阶层交错的(归难侨及低收入贫困阶层集中的)边缘化社会。这种边缘化社会环境很可能会导致归难侨群体在社会适应与向上流动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因此,归难侨群体的迁出背景(context of exit)与迁入背景(context of reception)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将分析马来亚归难侨群体归国前后的社会经济背景、所携带的政治资本及本地社会对他们的安置方式是如何影响其强势聚集的形

成,并且如何进一步影响第二代的融入状况的。

(一)政治资本与“分散”安置

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来亚政局动荡,一大批马来亚共产党员以及同情马共的群众被英国政府遣返回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涌华侨农场接收了一千多名马来亚归难侨。由于人数较少,当时政府将这些马来亚归难侨以“大集中,小分散”的模式^④安置在各个生产队,与农场内的“本地人”一起同吃同劳动。^⑤

黄昶就是其中一个被英政府遣返回国的前马来亚共产党员。黄昶1929年10月20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Perak),原籍广州郊区竹料镇东凤村。在日本侵占马来半岛期间,黄昶经人介绍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儿童团,参加抗日斗争。1946年7月1日,黄昶加入马来亚共产党。1948年,英国政府宣布马共非法,颁布紧急法令,1948年6月20日零时起对马共党员实施大搜捕。1952年7月1日,黄昶被叛徒出卖被捕,在当地警局饱受折磨而后被转送到全马最大的集中营——怡保集中营。1952年10月,黄昶被英当局告知离境。在海上渡过了7天8夜后,黄昶坐的轮船于1952年11月18日下午约5时经过虎门到达黄埔港。作为第22批回国的马来亚归难侨群体的一员,黄昶受到了当地政府以及地方社会的热情接待。黄昶在广州招待所待了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海陆丰农场工作,没多久调到南涌华侨农场,从事农业耕作。

马来亚归难侨回国大多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恰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中国国内侨务工作的任务是“加强对侨眷、归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切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庄国土,2001:277;奈仓京子,2010:172~173;G. D. Peterson,1988)。由于马来亚归难侨很多是曾参与马共及其外围组织的革命者或是支持同情革命的群众,他们来到农场后大多积极接受政府所倡导的“自力更生”“劳动光荣”的劳动

^①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1950—1988)》,内部资料,第5—7页;《1949年至2008年大事记》,内部资料。

^②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1988—2000)》,内部资料,第5—6页;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2005—2011)》,内部资料,未刊稿。

^③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2005—2011)》,内部资料,未刊稿。

^④ 马来亚归难侨群体本身被安置在农场属于“集中安置”,但将这些归难侨分散到其他生产队去而不专门编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队,则属于“大集中,小分散”的模式。这种分散安置不是绝对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国际难民的分散安置也不同。

^⑤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1950—1988)》,内部资料,第6页。

观念、“反对铺张浪费”的节俭观念以及“服从共同社会主义利益”的集体观念等，^①这为马来亚归难侨后续的适应奠定了良好的前提。

此外，马来亚归难侨群体第一代的融入过程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以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当时正值革命年代，中国对战争和冲突的基本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是人类事务中的普遍现象。二战后中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威胁，使这些战略文化的核心得以强化（秦亚青，2003）。这些思想也反映在中国对国际体系的看法上，中国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当时的国家建设是为了实现更大革命目标的一个时段，因此它应该支持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革命。这样的世界想象中又穿插着一定的“革命天下”的想象。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战线要搞“四面出击”，甚至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输出（项飏，2009）。

基于上述的历史背景，中国政府对于这批受排华风潮影响回来的前马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给予了较多的照顾与特殊待遇，为其个体的融入及群体的强势聚集的初步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1954年，黄昶被调到农场第三基建队工作，正式脱离农业劳动生产，进入华侨农场场部成为干部。1961～1965年黄昶先后任基建队副队长、队长，1963年转为行政干部24级。1966年1月，黄昶被省委组织部安排到北京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同年8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驾驶各种军用车及枪支射击。1967年5月，黄昶学习结业后回原单位工作，任农场基建队队长。1969年，黄昶加入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后，黄昶升任华侨农场基建站副站长、建筑水电安装工程公司经理，成为农场领导之一（当时农场领导相当于县级领导级别）。黄昶于1988年以离休干部的身份退休。黄昶今年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每月退休金近万元，看病费用全免，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上述黄昶的经历可以反映了相当一批马来亚归难侨干部的生活状况。而作为普通农场职工的其他马来亚归难侨则可以每月领取工资，享受公费医疗、退休养老。他们的退休金按照不同工龄和级别从3000元到8000元不等，生活无虞。

与其他国际难民不同的是，在各种影响马来亚归难侨群体实现社会融入的迁出背景中，除了人力资本（一些归难侨在回国前就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及见识）起着一定作用外，最为重要的是有不少马来亚归难侨拥有为当时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政治履

历”（如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这种政治履历的重要性在被转换到迁入地情境后得到了再次强化，从而衍生出这个群体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本。这些第一代归难侨来到农场后很快主动且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中国当时的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所宣传的主流价值观，从而较为顺利地融入安置地社会。尽管并非所有的马来亚归难侨都拥有所谓的“政治履历”^②，但由于有为数不少的马来亚归难侨在农场内部担任领导职务，使得整个亚群体内部所共享的资源要明显优于本地人及其他的归难侨群体。马来亚归难侨群体所形成的这种强势聚集以及亚群体网络中的积极因素都为第二代的社会向上流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代的选择性融入

华侨农场是长期受到国家特殊扶持的“政策性社区”（李明欢，2003），其内部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思维行为模式与外面的主流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居住在农场内部的归难侨子女很容易自然地地被农场当地的亚文化所吸引，反叛家庭而融入边缘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华侨农场内部形成的亚群体网络就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重点考察第一代马来亚归难侨所形成的强势聚集以及亚群体网络如何与家庭、华侨农场、本地社会互动，从而影响第二代的“选择性融入”的。

黄莉是前面提到的黄昶的小女儿，她的父母均是从马来亚回来的归侨。黄昶被组织送去北京学习期间，黄莉以及三个哥哥都被安排在省委高干楼住。她的三个哥哥被安排到高干子弟学校就读，而她则被安排到省委的幼儿园。为了让他们获得好的照顾，组织上还专门派了保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虽然生活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农场，但由于出身干部家庭，自小受到父辈严格而正统的教导，黄莉并未过多沾染华侨农场当地“不求上进”的亚文化：

虽然我们不知道爸爸是归侨，但平常并没有说要靠国家的特殊政策的，无论是从小读书还是后来工作还是靠自己多点吧。因为我爸爸也是这么希望我们的。他们也是比较传统的老革命，觉得凡事要自己自立。^③

由于受到国家倾斜性政策的特殊照顾，马来亚归难侨群体的整体生活状况一直到农场改制前都要

^① 根据2013年8月4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新光酒家与马来西亚归侨黄昶家的闲聊。

^② 根据黄昶的说法，实际真正参与马共及其外围组织的“革命者”才占到整个马来亚归难侨群体的30%。

^③ 根据2014年4月26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茶馆对马来亚归难侨第二代黄莉的访谈。

优于农场内部的本地人群体。但这个亚群体的价值观并不倡导“福利依赖”，而是鼓励个体“努力奋斗、向上”的行为取向。在这里，家庭教育通过亚群体网络得到重新强调与重塑，使得许多马来亚归难侨第二代一方面不仅充分重视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还会善加利用强势聚集的优势、亚群体网络内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的倾斜性照顾政策。20世纪70年代末，黄莉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父亲做领导的基建站，一年后到南涌中学当民办老师。而后通过自学获得函授大专文凭。在农场转制过程中，黄莉转成公办教师，目前工资待遇一个月有6000~7000千元左右。黄莉的丈夫是农场本地人的子女，为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公务员。两人生有一个女儿，从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入广州市的公务员行列。而黄莉的三个哥哥也都在农场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享受良好的待遇与地位。

如果说黄莉及其三个哥哥能够顺利融入本地社会，是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那么更多来自较差家庭背景的马来西亚归难侨第二代是否能同样实现融入呢？现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方敏本身是马来亚归侨侨眷。她的大舅由于资助马共而被英国政府遣返回国，方敏的妈妈程颖当时才9岁，跟着比自己大10岁的大哥（也即方敏的大舅）以及50岁的母亲回国。程颖小学毕业后留在农场革新队养猪，后与方敏的父亲（在农场工作的潮汕籍农民）认识并结婚。1964年，方敏出生于农场，在家里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方敏父母均为农场的普通职工，家境一般。方敏幼年时，父亲过早病逝，靠母亲一人养家，家庭更是陷入困境。

相比黄莉来说，方敏的家庭既没有良好的物质资源甚至也没有突出的政治资本，难以帮助个体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但方敏自小随母亲、舅舅生活在马来亚归难侨群体中，内化了这个群体所倡导的价值观，即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获得更好的生活机遇。再加上，方敏18岁高中毕业时，国家对于这些归难侨第二代仍然实行统包分配的政策，方敏在农场中学读完高中后就被直接分配进华侨农场工作。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方敏一直都十分勤勉：“我当时养了一年的猪，我的猪还养得很好，我那年还拿了先进生产者。”^①

与此同时，由马来亚归难侨强势聚集所带来的内部资源往往能够帮助群体内的成员克服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障碍，从而引导个体融入本地社会中。方敏后来的经历也体现出这一点：方敏在生产队工作了一年后，有一位在华侨农场场部工作的干部，同时也是20世纪50年代回来的第一批马来亚归难侨，发现方敏的文笔不错，而且还是马来亚归难侨的

子女，便有意推荐方敏进场部。方敏借助亚群体内的社会资本从华侨农场的生产队考进场部，脱离了农业生产。方敏进场部后还继续进修，通过成人自考拿到一家重点大学的文学学士，后又相继取得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学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南涌华侨农场经历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1992年设立管理区，赋予县一级经济管理权限；2002年底管理区划入广州开发区管理，作为其属下的正处级行政单位。方敏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转成正式的公务员。2008年设立南涌街道办事处，方敏还通过竞岗成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跻身南涌街的管理层。

与黄莉一样，方敏也是马来亚归侨子女成功融入本地社会的典型例子。尽管从家庭结构（父亲早逝，单亲家庭）以及家庭背景（家境一般）来看，方敏的家庭所给予的支持力度要明显弱于黄莉，家庭并没有足够多的资源为方敏提供引导和支持，但由于方敏自小就在一个与主流价值观契合的马来亚归难侨群体中生活，即使在改革开放、国家意识形态发生较大转变后，这个亚群体仍然拥有与本地主流社会相同的一套价值体系（有明确的向上社会流动目标、期望值和行为规范准则，即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刻苦勤奋而改善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些网络中的积极因素都能够与归难侨家庭联手，引导第二代避免来自农场底层边缘文化的负面影响。

此外，尽管马来亚归难侨内部形成了相对于外界的强势聚集，但是其作为一个整体是被分散安置在农场的各个生产队内的。这就使得马来亚归难侨群体的子女既能够享受到亚群体网络内的优质资源，又能与本地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我们的父母和本地人的父母是一起在农场创业的，所以我们从小孩子开始也都玩在一起比较多，不太会有区分吧。我们其实讲话都和本地人一样了。”^②所以，马来亚归难侨第二代的同化程度很高，无论生活习惯还是语言都与本地人相差无几。

综上所述，马来亚归难侨的第二代的社会适应并不是遵循完全同化于本地人的模式，而是一种选择性融入：他们进入就业期时，农场仍然实行统包分配政策，使得这批人至少能够利用“归侨侨眷”的特殊身份进入体制内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顺利地融入本地主流社会。而一些第二代还能经由马来亚归难侨亚群体网络，善加利用强势聚集所带来的优势及国家对于归难侨的特殊政策，在农场改制过程中

^① 根据2013年8月28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街道办事处对方敏的访谈。

^② 根据2014年4月26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茶馆对马来亚归难侨第二代黄莉的访谈。

成为公务员或进入农场的学校和医院工作,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较好地避免了由于地处社会边缘层的华侨农场所产生的亚文化的负面影响,实现了在地适应及社会的向上流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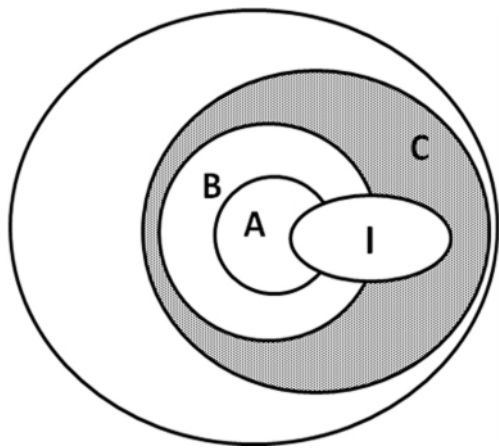


图1 马来亚归难侨及其第二代的选择性融入

I:个体;A:家庭;B:马来亚归侨亚群体网络(强势聚集);C:华侨农场(本地社会的边缘层);D:本地主流社会

三、“困于”农场:越南难侨群体的弱势聚集

与华侨农场内的马来亚归难侨相比,越南归难侨具有双重身份属性:文化意义上的国际回归移民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国际难民——从迁移的背景以及性质来说,马来亚归难侨也能算是国际政治难民,但与越南难侨政治被联合国认定为国际难民不同(孔结群,2012)。因此,越南难侨在迁出背景(归国前的社会经济背景、所携带的资本)及迁入背景(国家对这一群体采取的安置方式)上明显与前者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给越南难侨的族群聚集以及亚群体网络的形成带来了深远影响,并进一步形塑了这个群体在当地的融入。

(一) 居住隔离与弱势聚集

在南涌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大多祖籍广西防城、钦州地区,有些是第一代跨越国境到越南北部广宁、海防等地耕作的农民,大部分人是出生在越南的第二代、第三代。这些越南难侨中多数为华侨,其中少部分是入了越南籍的华人以及嫁给华人的越南媳妇。^① 这些越南难侨归国前的职业大多为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以及小企业主等。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越南排华及中越战争的影响,以国际难民身份被迫回到中国(C. Y. Chang, 1980)。当时南涌华侨农场首批接待安置越南难民500多人,至1986年底止,共安置难侨4497人。目前这批难侨还有3000多人,包括侨眷子女在内总

共有4000多人。^②

安置这批越南难侨时,国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改革的阶段,因而动用了各种行政资源、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将这批难侨安排在华侨农场里。考虑到当时越南难侨人数众多,当地政府采取了更为集中的安置模式,将这些越南难侨分配成几个独立运作的生产队,即“侨队”。侨队在农场的空间分布相对于本地人和马来亚归难侨的聚居区域较为独立。直至今日,越南难侨所在的社区与农场内的其他群体仍然相隔遥远,颇似被孤立的“飞地”(enclave)。而居住空间上的区隔进一步造成了“难侨”身份的延续与强化。此外,1978年以来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帮助越南归侨顺利适应陌生环境中的生产和生活的倾斜优惠政策,这也使越南难侨产生了与周边本地人不同的差异性认同——“难侨”或“国际难民”(孔结群,2010)。

基于此,集中安置的模式以及群体的自我区隔进一步导致第一代越南难侨形成了族群聚集,而这种聚集更多属于一种弱势聚集。首先,大多数越南难侨来自较低的社会经济背景,在回国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就较为贫乏,而且由于原居国政局动荡被迫回国、家庭四分五裂导致这个群体的社会资本急剧减少。在来到农场后,由于缺乏马来亚归难侨的“政治履历”,所拥有的政治资本更是微乎其微。其次,少数越南难侨在这个安置过程中,利用可能的亲属网络及其他社会资本,想办法留在了华侨农场以外的地方,也有不少难侨利用在国外的亲属网络移民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些难侨通过非正式渠道(如偷渡)进入香港、澳门,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机遇。可以说越南难侨的向外跨国流动更多是一个正向选择(B. R. Chiswick, 2013)的过程,也即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得以迁移。因此,只有那些既没有社会经济资源也没有海外跨国网络的难侨才最终被安置并长期留在农场。

越南难侨这种弱势聚集进一步阻碍他们获得亚群体网络之外的资源。以语言适应来说,由于居住空间上的地理隔离,越南难侨基本上都只与本群体

^① 根据南涌华侨农场1979年的越南难侨统计数据(内部资料),安置越南难侨为3492人,华侨占93.9%,越南籍华人占5.2%,越南人占0.9%。其中,来自广西省下辖区域的难侨占整个越南难侨总数的51.9%,来自海防的占22.1%。剩下的26%的难侨来自河内、西贡、海康、凉山同登、宣光山阳等地。1986年农场才安置完最后一批越南难侨,因此上述数据为不完全统计,但可大致看出越南难侨的来源构成。

^② 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1988—2000)》,内部资料;南涌华侨农场志编写组:《南涌华侨农场志(2005—2011)》,内部资料,未刊稿。

接触,这使得他们多以原本的母语“艾话”^①作为日常沟通的语言。很多越南难侨对于粤语和普通话不太熟练甚至不会讲,这进一步又影响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此外,越南难侨本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所拥有的资源贫乏、来农场的的时间较其他群体更为短暂,因此时常会受到来自农场其他群体的歧视与排斥。许多本地人以及马来亚归难侨明确向我们表示绝对不愿意把女儿嫁到侨队的,除非某家女儿错过了最佳婚配年龄或是难于出嫁才会考虑嫁给那些“越南难侨”。^②与马来亚归难侨亚群体的网络不同的是,越南难侨所形成的亚群体网络在具有强纽带性、强凝聚性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排斥性。这具体表现在这个群体网络与本地人、马来亚归难侨的网络是隔离与独立的,其所形成的亚群体网络与整个华侨农场出现某种脱节的状况。这进一步导致越南难侨亚群体内部资源同质性高且贫乏,这样的社会网络降低了个体与外界联系的可能性以及有可能摆脱边缘化境地的机会(M. P. Fernandez-Kelly, 1995: 213~247),使其“弱势聚集”的缺陷更为凸显出来,从而给成员的社会适应带来负面的影响。

这种负面影响在农场未被推向市场之前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第一代越南难侨^③依靠着国家倾斜性的扶持政策,回国后进入农场成为正式职工,享受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目前这批人大多已退休,退休金约有2000~3000元,生活较为稳定并且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应该说,这些越南难侨还算较为顺利地适应了农场内的生活。但华侨农场的环境即使适合第一代,也未必适合他们的子女。随着农场体制改革的推进,越南难侨第二代与其父母所面临的情境已大不相同。而越南难侨第一代所形成的亚群体网络虽然紧密但内部资源较为贫乏,导致第二代在个人成长中从家庭及群体网络所获取的资源极为有限,从而引发了“第二代衰落”的现象。

(二)第二代的衰落

赫伯特·甘斯(H. Gans, 1992)曾指出国际移民的“第二代的衰落”特别适用于描述南涌华侨农场的越南难侨第二代的现状:由于这批人成为劳动适龄人口时正面临华侨农场改制的关键期。与其他华侨农场相似,南涌华侨农场自成立以来得到了来自国家的倾斜性扶持政策的照顾。国家长期减免南涌华侨农场的农业、企业税收,承担起农场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广东省各级政府还动用财政大量补贴农场的经济亏损。然而,改革开放后,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生活在农场内部的越南难侨尤其是其第二代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其所能享有的优惠待遇逐渐减少。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华侨农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从1986年开始,华侨农场职工子女成年以后,不再自动转成农场职工。越南归难侨子女由此变成了“农场非职工”,他们生活在“农场”,却不拥有“农场的正式成员”的资格(李明欢,2011:279)。这批成年劳动力被直接推给市场消化。但由于这些越南难侨第二代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较低,脱离了国家的优惠性政策后,低人力资本的他们往往难以在农场外面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与此同时,越南难侨的弱势聚集无法提供给个体更多的资源与帮助,反而使其更易于受到来自农场边缘文化及价值观的影响,对其融入形成制约。

越南难侨第二代出生或成长于农场,形成了既不同于本地人、马来亚归难侨群体也不同于其父辈的独特的适应模式。他们部分地接收本地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向往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大多不愿意再像父辈一样逆来顺受、吃苦耐劳,接受薪资低、体力劳动时间长的农活,而希望能够从事薪资高而又无须长时间体力劳动的工作。地方政府曾针对失业或待业的归难侨及其子女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经过培训后的熟练工人还会被介绍到一些企业及工厂工作,但越南难侨对此意愿并不是很高。郑云的父母均为越南难侨,他本身出生在农场,说起自己的同龄人,他是这么看的:

像我这么年轻的,在侨队的,他们都不太想出去打工,就嫌累啊什么之类的,或者嫌远,就靠父母的退休金,因为父母是有退休金的,所以就吃父母的。我跟他们说过了,就是说以后这个父母要是万一都走了,没有退休金了,那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不想这么远的。这些(侨)队的年轻人,你说懒我也承认,我有一个堂哥,比我还大,就是靠父母的退休金,什么事都不做。出去就做了两个月的厨师,就不想做了,平时就是睡觉,女朋友谈了几个,也没有结婚,让他出去做事,他也不愿意。我和他说,你这样还年轻,什么都不做是不行的。但他也听不进。他们宁愿做“床长”(笔者注:躺在床上睡觉,终日游手好闲),不愿做“厂长”。我们社区现在就有几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不读书,什么也不做。尤其那些侨队的,喜

① “艾话”为粤西及广西南部等地区的一类客家语方言。

② 根据2013年7月11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街道办事处对本地人胡师傅的访谈。

③ 根据国际学术惯例,幼年时期(5岁以前)跟随父母回归的越南难侨被视作第1.5代。原因在于,这些越南难侨回国时尚年幼,对于原居国记忆模糊,社会化程度基本上是在农场完成的,其社会适应的模式、心态都与成年后才回国的第一代越南难侨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1.5代移民与真正出生于农场的第二代在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上更为相似,因此本文将这些1.5代越南难侨放在下文与第二代一起讨论。

欢一起打下麻将,树下聊天也不喜欢找点事做。^①

这些越南第二代对生活的物质期望要比他们的父辈高得多,而父辈所形成的弱势聚集又缺乏足够的资源满足第二代向上社会流动的愿望。这导致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本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负面亚文化(A. Portes, M. Zhou, 1993)在越南难侨第二代群体中产生。他们转而依赖父母的退休金、外来侨汇以及政府给予的补贴维持日常的生活。^② 甚至有些越南难侨第二代很早就辍学,过早未婚生育,利用政府的政策漏洞混日子。南涌华侨农场实行货币分房政策,每月都会给个人一定的货币补贴。由于这个补贴是按照人头计算,很多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越南难侨第二代能够因此分得更多的房屋补贴。南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来亚归难侨第二代的方敏对于越南难侨第二代这种“钻政策空子”的做法表示不满。有着归侨子女与管理者双重身份的方敏无法理解这些越南第二代为何“不更努力一些”,只能与其他地方管理者一样用“懒”来描述这些越南难侨第二代。可见,在越南难侨第二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华侨农场亚文化(强化自身“弱势”的地位及“难侨”的身份、依赖国家针对难侨的特殊政策和社会福利等)往往与当地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很容易引起基层社区对于这一群体的排斥与反感。在社区内部,越南难侨第二代甚至变成一个带有“污名化”意味的指称。

而作为基层代理人的街道,期待着这些社会化在农场完成的难侨第二代能够减弱甚至完全抛弃其国际难民的身份认同,逐渐成为真正的本地人,直至政府不需要特别针对这批人制定优惠性政策。然而,让地方政府意料不到的是,这种纯援助性的治理措施不仅没有换来越南难侨的“感恩戴德”,反而导致很多难侨无法跳出原有的“贫困陷阱”。越南难侨第二代甚至还认为自己仍是联合国安置在中国的国际难民,但他们在国家倾斜性扶持政策下形成的优越感在竞争中逐渐减少(孔结群,2012)。产生失落心理的第二代认为自己有权利继续享受来自国家的特殊照顾,而且对于政府的援助要求标准越来越高,进一步使得许多地方官员在处理与这些治理对象的关系上面临两难的尴尬境地:

最少的都回来有30年了,其实是不应该要再提归侨的特殊性的,但是他们就总是觉得自己的身份特殊,要求政府的照顾。其实他们回来这么久,就应该要融入当地社区,慢慢地就变成本地人的嘛,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融入,特别是那些越南回来的归侨。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第二代,总是觉得自己是归侨,有特殊身份,国家应该要照顾他们,还想要更多的归侨待遇。^③

此外,越南难侨群体虽然本身在农场十分孤立,但由于国际难民的特殊性,其与在逃难时被分配到海外及安置在国内其他农场的亲戚朋友联系比较多。他们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超越了区域的隔绝与民族国家的边界。这种接触和交流对于越南难侨来说是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的,是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的一种主体性尝试。但这种外向性无形中提高了他们对于生活的预期与标准伴随而来的还有“相对剥夺感”。这种农场之间的比较、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安置难民的比较所带来的越南难侨对于作为治理主体的基层政府及其治理效果的质疑。这使得一些南涌街的基层干部不愿意更多倾听越南难侨的意见,认为他们是“一群刁民”“只会无理取闹”。而且为了避免发生激烈冲突,承受维稳压力的基层管理者比以前更加刻意地回避与越南难侨群体的日常接触,进一步使得越南难侨及其子女在农场处于更孤立无援的处境,其亚群体网络所能够获得的资源更进一步被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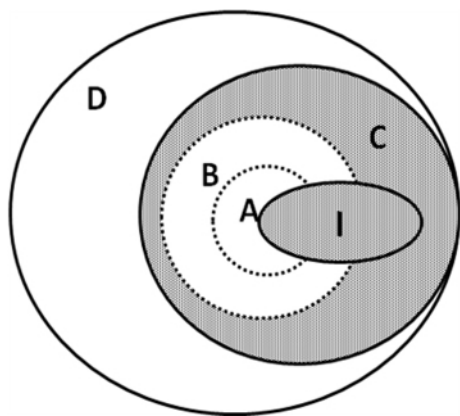


图2 越南难侨及其第二代的向下同化

I:边缘化了个体;A:边缘化了的家庭;B:越南难侨群体网络(弱势聚集);C:华侨农场(本地社会的边缘层);D:本地主流社会

在越南难侨的案例中我们发现,这些越南难侨第二代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均较低,仅仅依靠家庭难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实现向上流动,而与此同时越南难侨形成的亚群体网络资源贫乏,其群体文化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相差更远。越南难侨由于弱势聚集所形成的亚文化使个体容易忽视主体的能动性 with 创造性,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咎于被他们臆想和重构的历史记忆,由此形成对于国家的持续依赖,并将对

^① 根据2013年8月3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平安社区侨新队对越南侨眷郑云的访谈。

^② ^③根据2013年6月11日,笔者在广州南沙南涌街街道办事处对民政科谭科长的访谈。

现实利益的分配不满归咎于外因(孔结群,2010)。因此,越南难侨的亚群体网络不仅不能引导个体摆脱农场边缘文化的束缚,反而使其更易于滑向与主流社会完全格格不入的境地。越南难侨第二代一方面难以从本族群的弱势聚集中得到优质资源,另一方面从农场、本地社会、政府所获得的特殊照顾也只是饮鸩止渴,无法真正帮助个体树立勤勉刻苦的价值观并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这些越南难侨及其第二代只能被迫“困于农场”,融入本地社会的边缘层中(见图2)。

四、结语

本文在与西方多向分层同化理论以及相关族群聚集研究对话的基础上,以广州南涌华侨农场为例,探讨为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族群聚集类型——制度型族群聚集。本研究试图解释为何来自同一华侨农场、同样从社会最低层开始并且经历了同样的农场转型的马来亚归难侨群体与越南难侨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融入结果。

与西方多向分层同化理论所讨论的基础不同的是,本案例中的两个归难侨群体的聚集是由国家政策及行政力量所促成而非由个体选择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不仅考虑到归难侨群体是能动的实践主体,同时还考虑到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本地社会以及归难侨群体的网络、资源及价值观念等结构文化因素对于其社会融入的制约与影响。研究发现,归难侨群体重新适应和融入安置地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社会地位高低取决于群体融入安置地社会结构中的“哪一层”。而难侨群体所形成的亚群体网络及聚集状况(强势聚集/弱势聚集)是影响其多向分层融入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相对偏离主流社会的政策性社区,华侨农场无论是在资源还是价值观上都与本地主流社会相差甚远。在这种边缘化社区环境下的归难侨群体及其第二代很可能自然地被华侨农场亚文化(如过于依赖国家针对归难侨的特殊政策和待遇)所吸引。在这种情境下,如果亚群体本身是弱势聚集,网络内部资源贫乏,且与更大的社区之间相对隔离,亚群体只能够在内部形成与主流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亚文化,不仅难以引导个体摆脱农场边缘文化,反而使成员更易于融入本土社会的边缘层中,这是越南难侨及其第二代的例子。

而马来亚归难侨由于其迁出与迁入背景较为特殊,回到农场安置时被主流社会赋予了特殊的政治资本,这使其亚群体内部形成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再加上国家对于这一群体采取“大集中、小分散”的

安置方式,马来亚归难侨群体及其第二代不但能够享受到亚群体网络内的资源,又能与本地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由此形成强势聚集。马来亚归难侨依赖其强势聚集以及拥有优质资源的亚群体网络,往往能够引导第二代绕开华侨农场亚文化的负面影响,顺利融入主流社会中。

可见,归难侨群体成功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及其第二代成功地融入安置地主流社会的中上层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还取决于族群聚集状况以及亚群体网络所形成的资本,即华侨农场内归难侨群体的凝聚力及社区对家庭和个体的支持力。此外,归难侨群体由于其特殊的多国跨境经历,拥有着其独特的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完全抛弃国家特殊政策的照顾以及自身群体的文化并非改善归难侨群体及其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良方,利用自身的群体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给予这个群体的特殊政策才是归难侨及其第二代改善经济、融入社会的良策,也即所谓“选择性融入”。

最后,难侨群体所形成的亚群体网络与聚集状况固然受其个体、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类型与数量的影响,但是国家与地方政府也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于一些属于制度型族群聚集、其本身多由弱势者组成的群体来说,聚集本身带来的可能是族群内部资源的进一步贫乏,个体即使勉强实现在地适应,也是融入本地社会的边缘层中,无法实现社会的向上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应该针对制度型族群聚集尤其是针对弱势聚集的群体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

致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周敏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陈杰一起参与部分的田野调查,特此鸣谢! ☺

[参 考 文 献]

- 周敏. 2013. 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黎相宜, 周敏. 2013. 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田野调查与分析[J]. 民族研究, (10).
- 张春泥, 谢宇. 2013. 同乡的力量: 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J]. 社会, (1).
- 陈晓毅, 马建利. 2006. 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J]. 民族研究, (4).
- 李明欢. 2003. 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松坪华侨农场[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
- 李明欢. 2005. 侨乡文化的编织传承: 一个特殊侨乡的形成发展[A]. 李明欢. 福建侨乡调查: 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C].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明欢. 2011. 群体象征与个体选择: 华侨农场的改革历程与归侨职工的诉求[A]. 贺美德, 鲁纳. “自我”中国: 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刘朝晖. 2003. 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 松坪归侨社会地区认同的实证剖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
- 姚俊英. 2009. 越南归侨早期跨国再流动的人类学研究——以广州市近郊 H 华侨农场 YH 越南归侨社区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 俞云平. 2003. 一个特殊社区的历史轨迹: 松坪华侨农场发展史[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
- 奈仓京子. 2010. “故乡”与“他乡”: 广东归侨的多元社区、文化适应[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孙晟. 2003. 重建家园: 松坪华侨农场印尼归侨群体研究[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
- 庄国土. 2001.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秦亚青. 2003. 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种假设[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
- 项飏. 2009. 寻找一个新世界: 中国近现代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J]. 开放时代, (9).
- 孔结群. 2012. 越南归难侨的本土关系建构历程——基于广东小岭华侨农场的个案分析[J]. 南方人口, (1).
- 孔结群. 2010. 难民认同: 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
- R. E. Park and E.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 Zhou. 1997.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 R. Alba, V. Nee. 1997.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Theory for a New Era of Immig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 A. Portes, M. Zhou.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J].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30, November.
- A. Portes. 1995. Children of Immigrants: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A]. Alejandro Portes(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Y. Xie, J. E. Brand, B. Jann. 2012. Estimating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with Observational Data[J].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Vol. 42.
- E. Bonacich. 1987. “Making it” in America: A Social Evaluation of the Ethnics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30, No. 4.
- A. Portes.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 Y. Xie, M. Gough. 2011. Ethnic Enclaves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J]. Demography, Vol. 58, No. 4.
- M. Zhou, C. L. Bankston III. 1994.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Case of Vietnamese Youth in New Orleans East[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8, No. 4.
- M. Zhou, C. L. Bankston III. 1998. Growing Up American: How Vietnamese Children Adapt to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 L. Bankston III, M. Zhou. 1997. Valedictorians and Delinquents: The Bifurcation of Vietnamese American Youth[J]. Deviant Behavior, Vol. 18, No. 4.
- G. D. Peterson. 1988. Socialist China and the Huaqiao: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Areas of Rural Guangdong[J]. Modern China, Vol. 14, No. 3.
- C. Y. Chang. 1980.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s Policy[J].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82.
- B. R. Chiswick. 2013.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f-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A].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the Disciplines[M]. New York: Routledge.
- M. P. Fernandez-Kelly. 1995.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Urban Ghetto: 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 Sociology and Immigration[A]. Ed. A.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 Gans. 1992. Second Generation Decline: Scenarios for the Economic and Ethnic Futures of the Post-1965 American Immigrants[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15, No. 2.
- A. Portes, M. Zhou.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among Post-1965 Immigrant Youth[J].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30, November.

收稿日期 2014-10-14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钟莉]

[作者简介] 黎相宜(1985~), 广东广州人,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讲师。广东广州, 邮编: 510275。